

李
侃
著

近代传统与思想文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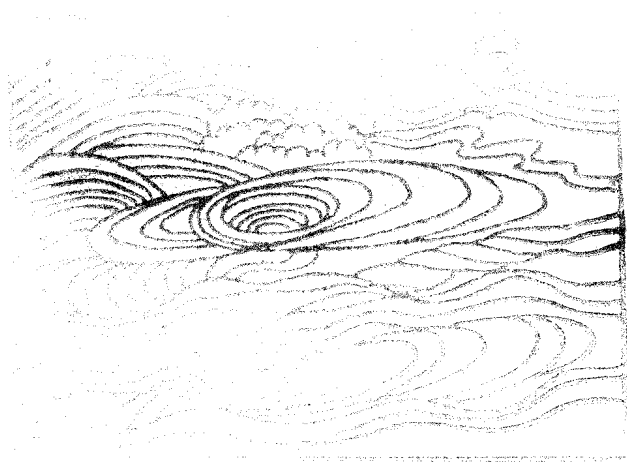
JINDAICHUANTONGYU

SIXIANGWENHUA



李侃 著

近代传统与思想文化



文化艺术出版社

特邀编辑 陈东林

责任编辑 博 骏

近代传统与思想文化

李 侃 著

*

文化藝術出版社出版

(北京前海西街17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北京冠中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1.125 字数 276,000 插页 2

1990年9月北京第1版 1990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3,100 册

ISBN 7-5039-0635-9/G·84

定价: 5.00 元

目 录

小 引	(1)
中国近代文化与社会主义现代化	(3)
中国近代文化与近代革命	(19)
中国近代民族觉醒与传统文化的命运	(39)
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	(57)
龚自珍与魏源	(61)
论林则徐思想的历史地位	(89)
洋务运动与近代文化	(104)
甲午冲击在思想文学领域引起的变化	(121)
戊戌维新与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	(137)
康梁思想同异述论	(163)
清末士大夫思想演变的缩影	(189)
——读《忘山庐日记》	
论张元济	(206)
孙中山与传统儒学	(228)
孙中山对辛亥革命失败原因和教训的认识过程	(248)
五四运动和蔡元培的品格素质	(266)
近代传统及其他	(278)
关于民主和科学的随想	(283)

门外私议·····	(287)
——儒学与现代化笔谈	
有关北京文化史的三个想法·····	(292)
一代奇才梁任公·····	(295)
——梁启超在思想文化上的贡献	
附 录	
1980—1984年中国历史学概述·····	(300)
在更新和开拓中前进·····	(322)
——谈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现状和发展趋势	
中华书局的七十年·····	(337)

DQ 43/36

小 引

八十年代以后的几年中间，我对中国近代文化问题发生了兴趣，陆陆续续写了一些这方面的文章，现在汇集成册，定名为《近代传统与思想文化》。

这些年在理论界、学术界掀起了一股“文化热”，近代文化也逐渐成为近代史研究领域的一个热门课题。在讨论和探索中，各种不同的观点层出迭见；各种意见的分歧相互争鸣。在诸多的煌煌高论中，我的这些文章未免相形见绌。不过我始终认为，谈论近代思想文化，总不能脱离中国近代社会的历史现实。“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文化是社会历史的产物，没有近代中国社会的急剧变化，也就不会有区别于古代文化的近代文化；没有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主义的压迫，没有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斗争，近代文化也就无从谈起。因此，在对近代文化进行回顾与反思的时候，倘如忽略了或者脱离了这样一个基本历史事实，那么不论是怎样的高谈阔论，恐怕也只是站在云端向空高喊而已。

我的这些粗浅文章，可以说卑之无甚高论，只是试图通过对中国近代历史进程的考察，回顾一下在近代中国的思想文化领域发生了一些什么变化；封建的旧文化在社会的剧烈动荡和变革中，受到了怎样的冲击和挑战；近代新文化的产生和形成经历了怎样曲折艰苦的斗争过程，它对推动中国社会的发展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而新思想新文化的先驱者们，为了挽救民族的危亡，

为了社会的进步，是怎样地披荆斩棘、继往开来，创造了光辉的历史业绩，留下了珍贵的历史遗产和优秀的文化传统。我在一篇短文里说过这样的意思：讲文化传统，应该包括近代传统；讲文化遗产，应该包括近代遗产。而近代文化传统和文化遗产中最值得宝贵和发扬光大的东西，就是为救国救民而寻求真理，为不甘落后而追求新知，在开拓和创造中充满着爱国、变革、革命和开放意识。如果否定了这个传统，丢弃了这份遗产，那么近代文化还剩下什么呢？后来的人们还能从近代文化中汲取什么有益的精神滋养和思想启迪呢！

我深深感到近代文化是一个内容丰富而广阔的领域，而我的探索又是多么表层而肤浅，我不过是刚刚走近它的边缘，或者只是站在它的门槛外面举目张望而已。然而我并不后悔自己的浅薄，因为我无意掩饰自己的粗疏，也没有自成一家的奢望，只是凭着自己的感受，说出自己的想法。

当初写这些文章的时候，并没有什么有系统的构思，不料汇集起来的时候，却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这一历史阶段的各个时期都不同地有所涉及。其中也有几篇是属于泛论性的东西。所有这些文章，除了个别篇章在文字上略作改正之外，都依照原样，因为这样更能反映自己真实思想。书中的《龚自珍与魏源》、《孙中山对辛亥革命失败原因和教训的认识过程》两篇是与陈东林同志合写的；“附录”中的《1980—1984年中国历史学概述》是与田居俭同志合写的。这里我要感谢陈东林同志帮我校阅了全部文稿和引文。还要感谢文化艺术出版社慨然应允将此书出版，谨此一并致谢。

李 侃

1989年8月10日

中国近代文化与社会主义现代化

近些年来，中国文化史的研究气氛活跃。这种探讨和争论，反映了改革开放这个时代的主旋律，适应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历史主题的需要。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能脱离中国的国情，而国情又不能割断和忽视历史。历史形成的传统文化，深刻而广泛地塑造着、影响着我们这个民族的性格、心理、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对于传统文化，不论是赞美它还是蔑视它，不论是主张保守它还是主张屏弃它，它作为一种历史的存在和社会生活多样性的创造、延续和积累，是不会以人们的主观好恶，而得以原封不动地保存或者像抛弃敝屣那样，丢掉完事的。文化的进步与更新，是在既承认传统又反对传统，既批判传统，又继承和发扬传统的历史辩证的矛盾和统一中发展的。在对于传统文化的估价中，那种认为非好即坏，要么完全肯定，要么一笔抹煞的绝对的、片面的观点，早已被实践证明是一种不可取的观点和方法。

提到传统文化和文化传统，一般的说法总是把“传统”这一概念限制在近代以前的文化结构和文化形态，或者说主要是指封建社会时代的文化。其实，传统文化是一种动态性的演变、延续和积累过程。因此，我认为讲中国传统文化或文化传统，也应该把近代文化包括在内。中国近代文化是中国近代社会的产物，它是在与旧的封建社会长期形成的传统文化的冲突和挑战中产生、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是适应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而引发的文化

结构、文化心理和社会价值观念一次历史性的更新。而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又是从近代社会，即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脱胎而来的。如果说近代以前的传统文化，对于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仍然有着积极的或消极的影响的话，那么中国近代文化对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影响就必然更深。为了探讨中国近代文化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联系和其现实意义，就不能不略为回顾一下中国近代文化的历史状况，用现在流行的语言来说，进行一番反思。

一、中国近代文化的历史作用与历史缺陷

从鸦片战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共经过了 109 年。前 80 年通常称为旧民主主义革命，后 30 年则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在这一百多年中间，中国社会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在停滞的、封闭的古老封建社会的土壤上，在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反抗外国侵略和封建压迫的艰苦斗争中，产生了新的政治、经济力量 and 新的文化形态。这种新的近代文化，是怎样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追溯历史，历览事实，可以这样说，中国近代文化，并不是在中国封建社会自然经济和宗法制度的土壤上自发生长的意识形态。它是外国侵略造成的中国民族独立地位和国家主权的丧失，并伴随封建经济结构的逐渐解体 and 民族意识的逐步觉醒而产生的。在近代中国，什么样的文化能够唤醒长期沉睡的民族觉醒，什么样的文化能给濒临衰竭的国家社会肌体注入新的生机和活力，什么样的文化就会显示出巨大的生命力。什么样的文化无助于或有碍于民族的觉醒 and 社会的进步，什么样的文化就要失去活力而被淘汰被改造。因为中华民族面临着生死存亡的问题。封建统治阶级尽管也不愿意屈服于外国侵略者的压迫 and 摆布，但是他们已经腐朽了，再没有能力和办法去解除这种压迫；作为封建制度的理论基础 and 精神支柱的以儒学为核心的传统文化，虽然也在

极力要保持自己的统治地位，但是它已经无法阻挡“西学”的冲击。在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近代文化的冲击与反应、引进和拒绝、对立与折衷、效仿和移植、容纳和倾倒、吸收和融合的过程中，传统文化可谓步步败退，溃不成军。而对于近代西方文化，则由“夷狄”而“西儒”，由“野蛮”而“先生”，由异端邪说而救国真理，由器物而制度，由制度而观念，可谓步步发展，层层深化。近代文化史上的所谓“师夷长技”与“用夏变夷”之争，“中体西用”与“大兴西学”之争；科举与学校之争；新学与旧学之争；“打倒孔家店”与保存“国故”、“国粹”之争，本位文化与全盘西化之争等等，归根到底，就是什么样的文化可以救中国的问题。历史发展的过程，新陈代谢的法则，都向人们表明，不管新旧文化的斗争怎样复杂，道路怎样曲折，近代的新文化总要战胜和取代封建的旧文化。不管文化的这种嬗变怎样缓慢和艰难，但是历史发展的总趋势和中国的前途命运，要么是从古代走向近代，从东方走向世界；要么是在封闭和窒息中丧失生存的权利，成为世界资本—帝国主义的奴隶。而走向近代和走向世界的根本条件，首先就是要使自己摆脱侵略者的压迫和奴役，使国家独立富强起来。于是才引起了向西方学习的渴望，也才有近代文化的发生和滋长。用外国学者的说法，叫做西方的冲击引起了中国的反应；用中国人的话说，就是外国的侵略引起了中国人的觉醒和反抗。中国近代文化就是在这种冲击与反应、侵略与反抗的过程中产生的。这种区别于古代的新文化，尽管还带着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所特有的种种弱点，但是它作为新的文化形态和新的精神力量，给中国近代社会注入了新的活力，对中国近代社会的进步和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第一，近代文化对中国近代的历次社会变革和革命运动，在思想理论上起了先导作用和指导作用。特别是在太平天国革命失败以后，这种作用更加明显。从洋务运动的“中体西用”、“中道

西器”，到后期某些具有维新思想倾向的洋务思想家的“中西兼采”，“道器互用”，从戊戌变法时期的进化论、民权论、君民共主论，到辛亥革命时期的天赋人权论、民主共和论、自由、平等、博爱学说；从五四运动时期的科学与民主，到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可以说每一次改革，每一次革命，从思想文化上说，都是向西方学习救国真理，都是西方近现代的社会政治学说，近现代的文化形态向古老中国传统文化的冲击。冲击的结果，是“西学东渐”引起了“中学”衰微。西方近代文化，何以会对中国传统文化战而胜之，或在一部分知识分子群体中取而代之，成为社会变革的思想武器，究其原因，就是救亡图存的迫切需要。尽管近代中国社会动荡剧烈，各种社会思潮起伏不断，各个不同的阶级、阶层、集团具有不同的政治主张，提出过不同的救国方案，但是在各种思潮中有一个共同的主流，这就是怎样救中国。因此，爱国主义就成为近代文化的一个突出内容和主题。我们现在翻开近代中国思想文化先驱者们所留下来的众多文献，几乎找不出哪一位开明的、进步的、革命的思想家和“文化人”不是爱国者，很少有人离开救国、救亡而孤立地谈论文化。炽烈的爱国激情，迫切的变革要求，勇敢的思想启蒙，“三位一体”；爱国志士，革命先驱，文化战士，集于一身；构成了中国近代文化一大特色。

第二，近代文化的产生和兴起，在激发了中华民族的觉醒和增强了近代国家意识的同时，还起了思想解放的作用。西方近代文化的引进和吸收，打破了传统文化的封闭状态，使得一部分士大夫和新式知识分子，重新认识世界，也重新认识中国。中国外部的世界，再不是如古书中所说的没有礼乐教化的蛮荒野夷了，何止不是“蛮夷”，而且其政教科技远远高出我们这个华夏之国、礼义之邦。正是这种对中国和世界的重新认识，打破了故步自封、盲目自大的文化心态，产生了挽救中国和改造中国必须急起直追的迫切感和责任感。正是近代文化的先驱者们，背负着沉重

的历史负担，挣脱着传统制度、传统观念的抑压和束缚，急切而勇敢地探索追求，开拓进取，冲决罗网，解放思想，把审视的目光投射于中西文化的对比上，把注意力倾注于中国贫困、衰弱、落后原因的探究上。从十九世纪中叶到二十世纪中叶的近百年中，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群体，冲破封闭的文化思想牢笼，对以往几乎是完全陌生的西方文化的各个领域，各种学说，几乎都有所涉猎，有所介绍，有所传播。在介绍和传播中，在对中西文化关系以及“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上，也不止一次地发生过分歧和争论。而传播文化的近代媒介和载体，诸如学校、报刊、图书出版等等，也在中国的土地上出现。现在的人们，在谈论和比较中西文化的时候，往往感到中国近代文化的贫乏和落后，但是如果我们客观地冷静地考察一下当时的中国和西方世界的状况，就会感到近代文化的先驱者和开拓者们，几乎是在如饥似渴地学习和吸收，马不停蹄地奔跑和追赶。他们的业绩是巨大的，精神是可贵的。如果说在中国近代社会黎明之前，在中国文化的夜空中也曾出现过群星闪耀的时期，那么我们可数出许多文化巨星，远的不说，仅从中日甲午战争前后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半个多世纪的社会变革中，就孕育、涌现一代又一代的文化巨人。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孙中山、章太炎、蔡元培、张元济、王国维、鲁迅、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郭沫若、茅盾、范文澜、郑振铎、闻一多、李四光、张大千、徐悲鸿、齐白石等等，都称得起是光芒璀璨的文化巨星。他们代表了近代中国文化的精英。说到传统，近代文化自然也有其优良的传统；说到遗产，近代文化自然也有其珍贵的遗产。近代文化的传统，可以说是爱国、革新、开放、追求、探索、革命的传统；近代文化的遗产，可以说是对古代传统文化批判、更新，对西方文化学习、选择、吸收、融化的遗产。如果我们追溯中国古代文化形成、积累、延续五千年的历史，再回顾近代文化产生、形成不过一百多年的历史，恐

怕可以说一百年胜过五千年。因此，尽管近代文化的发展还不够完善和成熟，但是却没有理由鄙视和轻蔑近代文化的深刻而巨大的历史变革。

近代文化是近代社会的历史产物。它的产生、演变、形成和发展，都与中国近代的政治、经济变革密切相关。我们在肯定它在推动历史前进中所起的巨大作用的同时，也还要看到它的历史缺陷。

为救亡、变革和革命在思想理论上开路，为国家的独立富强而呼喊，文化与政治密切结合，这本来是中国近代文化的一大特点，也可以说一大优点。然而也正是因为文化与政治结合得过于紧密，也就产生了一种文化上的历史偏颇，即文化过分从属于政治，或者完全服从于政治。而由于近代社会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异常尖锐，由此而产生的政治分野和政治斗争也异常激烈，这样，政治斗争就往往是或经常是在文化斗争中表现出来。整个中国近代史上，文化思想上的论争和论战不断，论战的双方可谓两军相对，壁垒分明，其实几乎没有哪一次文化论争和论战，是“纯粹”的文化之争和学术之争，而是政治斗争在意识形态和文化领域的表现。前面说过近代中国确曾涌现出许多出类拔萃的文化巨匠，但是我们几乎找不出几个与政治斗争无关的所谓“纯粹的”文化名人。注重意识形态，对于救亡和革命本来实属需要，不如此就不足以显示文化的作用和威力，但是过分地强调意识形态，又往往在思想文化上形成了一种非敌即我、非进步即保守、非正确即错误，甚至非革命即反革命的绝对化的、片面化的观念。从而在思想文化上排除了兼容并包、多元化、多样化的格局。这种偏颇，在抗日战争期间，由于文化统一战线的形成，情况曾有所改变。而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虽然也曾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但不久就强调所谓“舆论一律”，并且把“双百”方针解释为只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家。所谓“文

化大革命”，所谓“在意识形态领域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其结果是阻碍了文化的繁荣和发展，甚至窒息扼杀了文化。而这种可悲局面的出现，固然有其现实的政治思想原因，恐怕也有其历史原因。

前面说过，整个近代历史的主题是救亡图存。历史实践已经证明，只有革命才能救国。然而并不能由此就得出结论，除了革命之外，其他所有的救国主张都是错误的，都应该批判。就以救国这一历史主题而论，除了坚持革命才能救国的民主主义革命者和社会主义革命者之外，还有些爱国人士提出过“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科学救国”等等救国主张，其中不少人士不但提出这样的主张，而且付诸实践。他们真诚地，甚至可以说是历尽艰辛、呕心沥血地兴办实业、兴办教育事业和科学事业。当然，这些良好的愿望和主张，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统治下的旧中国是不可能实现的，但是不能达到目的是一回事，这些爱国者的动机和愿望又是一回事，何况中国又实实在在缺乏“实业”——近代资本主义工商业；教育和科学也十分落后。兴办实业，发展社会生产力；兴办教育，培养人才；兴办科学事业，掌握近代科学技术，都是为改变贫穷落后所必需。即或在革命时期，这些主张和实践，也有无可辩驳的合理性和进步性。而在很早以前，甚至还在民主革命时期，就有一种名为激进实际上是偏狭的认识，仿佛除了革命（主要是暴力革命）以外，所有其他的救国主张都是“虚伪的”，或者都是与革命对立的。如果说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科学救国等等主张，在没有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统治的历史条件下，还不那么现实，甚至还带有某些幻想成份的话，那么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已经取得胜利之后，这些主张就不再是虚幻的空想，而是当务之急了。革命使中国改变了受侵略受压迫的处境，但是却不能很快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历史的中心主题，早已由救亡和革命转变为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这就要求集

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把教育和科学事业提到重要的议事日程上来。然而，与历史形成和延续下来的过分强调意识形态的倾向不无联系，在社会主义制度已经确立，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的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把阶级斗争持续化、扩大化、绝对化，“以阶级斗争为纲”不仅成为政治生活的主题，而且成为思想文化的“主课”，不断的政治运动和不断的思想“批判”往往是而且经常是从思想文化领域“开刀”，也就是从文化界、知识界“发难”。这样人为的斗争和批判，不但伤害了很多文化人和知识分子，而且殃及前人，把近代的实业救国、教育救国和科学救国的倡导者和实践者，统统当做资产阶级的观点，看做是与革命对立的思想主张加以“批判”。其结果是，表面上和行动上十分重视意识形态，十分注重“文化”，而实际上则是轻视文化、轻视教育、轻视科学、轻视知识，当然也轻视生产力。而其极端的发作，就是“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

检验一种文化是否有生机和活力，归根到底要看这种文化是促进还是阻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当着不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压迫，不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状态，不对封建的传统观念进行批判，就不可能解放社会生产力的时候，最主要最直接的斗争任务，当然是要用革命的办法，去解除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但是在经过革命斗争，解除了这种压迫之后，就应该而且必须把全民族的注意力集中于发展生产力，否则就不可能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状态。“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但革命却不是无休止的历史奔跑者和社会生活的永恒建设者。所谓“不断革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论，其结果是导致对革命终极目标的自我否定。因为它不是为了人民的幸福、自由和富裕，最大限度的满足人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需要而革命，而是为革命而革命，甚至为了某些个人的权力的需要和体现某些个人主观意志而革命。当着文化作为新的解放社会生产力的思想理论的先导者，为革命

在意识形态领域开路的时候，这种文化是一种生机勃勃、所向披靡的精神力量，但是当作为意识形态的文化，完全屈从于政治权力而不能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起积极的推动作用的时候，它就会伴随生产力的停滞而僵化和萎缩。文化是社会的人所创造的，但文化又不是人们可以任意摆布的。蔑视文化，必然要受到历史的惩罚。

与上面说的近代文化历史缺陷相联系，就是在把全部注意力集中于救亡和革命这个历史主题的时候，相对地忽视了全民族文化科学素质的提高。救亡和革命的斗争实践，固然极大地激发了民族的觉醒和阶级的觉醒，但是这种觉醒并不能改变文化科学落后的状态，在革命和战争年代，对救亡图存和翻身解放的宣传，远远多于近代民主、科学的思想启蒙，民族意识、救国意识和革命意识的激扬，无疑是当时历史任务的迫切需要，但它并不能代替全民族文化素质的提高，也不意味着有了民族意识和革命意识，就必然具有现代文化意识。一个民族的文化知识和思想道德素质，或民族的文化心理，表现为民族的性格，也可以说是“国民性”。中华民族的性格，或中国的“国民性”到底怎样？这是一个很大也是很复杂的问题，不可能用好和坏、美丽和丑陋来简单的概括论定。我想首先应该承认一个事实，这就是我们这个民族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创造了伟大的文明史，延续和积累了五千年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化。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残酷的压迫和剥削，难以忍受的天灾人祸，都未使中华民族沉沦泯灭，巨大的创造力量、勤劳勇敢、自强不息、坚韧不拔的精神，构成了中国民族文化的优秀方面的特质，也就是“国民性”优良的一面。但是还有另一个方面，这就是在漫长的小农自然经济和封建宗法制度、宗法观念的束缚压抑之下，造成了民族文化和“国民性”的扭曲和“异化”，保守和愚昧、落后和自私、迷信和麻木等又构成了“国民性”劣质方面。当着历史迫使中国向古代告别，不奋力自救图

强，就不能置身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威胁到来时，“国民性”要不要改造，要不要更新，这是早在十九世纪末叶和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就已经有人提出的严重问题。甲午战争以后不久，大倡“西学”的严复，就提出了开民智、新民德、增民力的主张。梁启超在日本主办《新报》的时候，就以“新民”为主题，写了一系列更新国民性的文章，集结成书为《新民说》。孙中山把国民分为先知先觉、后知后觉和不知不觉三部分人，从而为实行他的“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在“军政”和“宪政”中间加上一个“训政”阶段。特别是鲁迅更执著于国民性的改造，他的不朽文学生涯就是痛感于必须改造国民性而由“医人”进而立志于“医国”的。而他的许多文学作品，如《阿Q正传》、《祝福》、《孔乙己》等等，都反映了他对国民“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精神，在鞭挞中包含着同情，在哀怜中深寄希望。当然，对以往的先驱者们关于“国民性”问题的评论和主张，需要做历史的分析，像梁启超那样，强调国民性的“恶劣”，以“民智未开”，“民德未新”为理由去抵制和反对革命，认为中国人没有做“立宪国民”和“共和国民”的资格，这当然是一种政治和阶级的偏见。但即使如此，他的意见中也含有一定的正确部分。至于鲁迅对国民性问题的观点和态度，那就更是激励国民奋发向上的精神药石了。许多革命志士，在批驳梁启超等人关于国民性问题的谬误的时候，虽然理直气壮，但是把这个问题看得过于简单和过于容易了。他们认为革命一起，民智自开，国民性就会焕然一新。其实，问题绝不是如此简单。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统治，建立了中华民国，但“民智”并未因为推倒皇帝而“大开”，共和民主观念非但并未“深入人心”，而且就多数中国人来说，他们的思想观念和大清帝国统治下的“臣民”并没有发生很明显的变化，鲁迅笔下的阿Q、闰土、赵老太爷、假洋鬼子、九斤老太，仍然是清朝时期农民、绅士心理状态和精神面貌的活的典型。“国民性”问题，本来是一个关系到中国民族素